

早期中国的政治与文明

文史哲编辑部 编

文史哲丛刊

 商务印书馆

文史哲丛刊

早期中国的政治与文明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務印書館

2011年·北京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哲学论丛》、《汉语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刘 培	刘京希
李 梅	李扬眉	宋全成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璜	贺立华	曹 峰

目 录

说“夏族”

——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 沈长云 / 1

“多子”、“多生”与殷商社会结构 …… 刘孟骧 / 21

商代继统法新探 …… 詹鄞鑫 / 34

西周春秋时期的国野制与部族国家形态 …… 胡新生 / 47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 杨天宇 / 66

就秦汉奴隶制度谈古史分期问题 …… 田昌五 / 81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

“城旦舂”的身份 …… 徐鸿修 / 103

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农村公社残余问题 …… 张金光 / 129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 杨振红 / 150

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 …… 高 敏 / 193

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 …… 韩连琪 / 202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牟发松 / 224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	臧知非 / 252
“火历”三探	庞 朴 / 275
荀易庸记要	李泽厚 / 294
中国原始阵法“伏羲先天圆阵”考述	商庆夫 / 325
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	马 新 / 349
山东龙山文化“去脉”之推论	蔡凤书 / 364
舜和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的南移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片断	刘敦愿 / 377
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和扩散	栾丰实 / 392
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	方 辉 / 408
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初步考察	李学勤 / 422
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刍议	朱凤瀚 / 426
大辛庄甲骨文与商王朝对东方的经营	李伯谦 / 432
后记	/ 438

说“夏族”

——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沈长云

最近，在对前一阶段夏文化研究进行清理的过程中，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个为许多学者所忽视，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夏族”？这个问题，应当说是认识夏文化的前提。过去夏鼐曾提出过“夏文化”的概念，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①，对此，许多从事夏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是赞同的。既然如此，那就应该首先把“夏民族”或者“夏族”的概念弄清楚，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人们共同体，是由哪些居民所构成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却从未见有人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偶与一二考古界的朋友提及这个问题，大家也显示出一脸的疑惑，表示从未考虑及此。难道这真是一个可以置之不顾的问题么？当然不是。这里面涉及有关夏文化及夏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事实上，由于“夏族”概念的不清已造成人们对夏文化及夏代历史的诸多误会，我们实在有必要把“夏族”的概念弄清楚。

①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第32—33页。

什么是“夏族”？是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吗？答曰非也。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民族应是在超越了人们的亲属血缘关系及氏族组织所造成的地方局限性的基础之上，在更大范围内按地方行政区划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①，夏王朝时期的居民显然还没有进化到这个地步。大概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现在不少学者又或称“夏族”为“夏部族”。那么，什么是“夏部族”？是指夏后氏这一支氏族吗？当然也不是。尽管历代夏王皆出自夏后氏这一支氏族，但说由一支单一的氏族组成为一个国家，恐怕没多少人会赞成这个道理。何况大家说的可以和夏文化画上等号的二里头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的偌大一片地区，亦非一个氏族的居民所居住得了的，至少还有其他一些与夏后氏同姓的姒姓族人居住在那里。那么，“夏族”是指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多支姒姓氏族吗？好像是，却又不尽然。因为夏王朝统治时期，其统治区域内，即使在其中中心统治区域内，都绝不会仅仅生活着一些只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姒姓族人，至少还应当有一些与他们通婚结婚的其他异姓氏族。他们与诸姒姓族人错居杂处，共同繁衍生息，亦是夏后氏统治下的基本族众。如果谈“夏文化”，他们的活动遗存想必是不能排除在外的。

唯一的解答是，“夏族”（或曰“夏民族”、“夏部族”）是构成

① 参见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及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夏代国家主体的众多夏后氏的同姓与异姓氏族的统称。

之所以强调“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众多氏族，是考虑到了夏代国家的结构。这里涉及了三代国家的内外服制度问题。我们认为，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那些氏族应该就是作为夏代国家内服成员的氏族邦方，所谓“夏族”主要应是指这些氏族。

按文献称我国夏商周时期乃是一种“天下万邦”的政治格局，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以上诸“国”字，本当作“邦”，乃后世避讳改，西周金文皆作“万邦”可证。）王朝直接统治的对象是众多大大小小的族邦。这些族邦，于夏代称作某某氏，如夏后氏、有莘氏、有虞氏、昆吾氏、斟寻氏、斟灌氏之类；于商代甲骨卜辞称作某某方，如周方、鬼方、土方、羌方、井方、黎方之类；于周或称作某方，或称作某邦。其实“邦”、“方”音同通用，皆氏族性质的血缘亲属组织。它们以其对王朝的服属关系的不同，可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部分。关于夏代的内外服划分及其所涉及的族氏，目前学者间尚未论及，这里可借商周时期内外服制度大致勾画之。

《尚书·酒诰》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湏于酒。”这里谈到商的内服成员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百姓、里居（君）”，即朝廷上的各种官吏以及王畿内的宗族长（宗工）、贵族（百姓）等；外服则包括具有侯、甸、男、卫几种职衔的王畿以外的族邦首领。其中，外服邦方的首领较

好理解，他们是居住在商王朝周边地区的邦方的首领，周初《大盂鼎铭》称其为“殷边侯甸”，正道出了这一事实。见于甲骨卜辞，商王朝中心统治区外确实有一大批各种名称的方国，它们对朝廷的服属关系，主要是建立在朝廷强大的武力威慑基础之上的，其中多数实际上是对朝廷时叛时服，因而这部分方国实难构成商代国家的主体，称它们作“商族”，恐怕有些难副其实。那么作为商代国家的主体，或者说构成商王朝骨干势力的那部分氏族，就只好求之于“内服”部分的氏族了。

所谓内服，自是相对于外服而言的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服属人员。这个地区又称作“王畿”，畿者近也，实即王都附近地区。《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方千里左右的王畿，就是内服之地。这里面也居住着大大小小的族邦（包括商王所自出的王族邦），只不过他们与外服邦方的性质不同，主要由王的同姓和姻亲组成。这些族邦的首领同时担任着朝廷的公卿大臣，如《酒诰》所称之为“百僚、庶尹”等朝廷官吏，即主要是由王的同姓与姻亲贵族充任的，故后人以为王畿内之都鄙，既属“公卿大夫之采邑”，亦属“王子弟所食邑”^①。见于甲骨卜辞，在商朝“大邑商”周围居住的，首先即是一批被称作“王族”或“多子族”的商王同姓氏族。其中王族应出自历代商王的王室家族，多子族则是众多商王的兄、子之族。关于多子族的分布，学者曾综合有关考证指出，他们“皆集中在今豫西北，距当时的王都（今安阳）不远”^②。

① 郑玄注《周礼·大宰》之语，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6页。

②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因此把他们说成是商的“畿内诸侯”，似不会有何问题。这些子族的首领，亦担任着朝廷的各种官职。殷卜辞中，他们往往以商王臣僚或领兵将领的身份出现，其中如“子禽”^①，卜辞又或称作“小臣禽”^②；“子妥”^③，卜辞又或称作“小臣妥”^④，皆可为之佐证。

除此类商王同姓外，王都周围又多居住着商王室或子姓贵族的姻亲氏族，卜辞称之为“多生”。“多生”可读为“多姓”或“多甥”，无论何种读法，皆可视之为与商异姓的商的姻亲贵族。他们亦受到商王的尊重，卜辞有“惠多生飧”，与“惠多子飧”对贞^⑤，表明众商王的姻亲贵族与众商王的同姓贵族一起受到商王的燕享。卜辞又有“惠多生射”^⑥的辞例，表明“多生”又能参与商王举行的祭祀典礼上的射仪。“多生”既能参与商王举行的燕享及射仪，则其与所率领氏族居住在距商王都不远之处可知。“多生”亦可担任朝廷官职，卜辞又有“惠多尹飧”^⑦的辞例，虽不能说“多尹”一定可以与“多生”画上等号，但至少包含了“多生”是没有问题的，“多尹”即商的各级官吏的统称。

这些商的同姓或姻亲族邦对商王室的服属关系当然属于另一种性质，它是在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的共同利害关系的结合。这种结合相对“外服”对朝廷的服从关系来说，自然要稳定得多，且一般

①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335号，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5572号。

③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2038号。

④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5578号。

⑤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27650号。

⑥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24140—24143号。

⑦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27894号。

并不需用武力来维持。相反，王室倒是把他们看成是朝廷的依靠力量，故而才有他们的首领在朝廷上担任各种臣僚的情况。总之，如果说商朝也有一个“商族”的话，那就是以上这些内服的氏族成员了。

西周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周人的故居周原及镐京、洛邑附近，首先居住着的是一批周室子弟及姬姓贵族，如人们熟知的周、召、毕、荣、毛、二虢、井、南（南宫）之类。他们同时也是周朝廷上的公卿大臣，这也是无须辞费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姬姓贵族的居住地内，也错居杂处着一批非姬姓，但与姬周贵族保持着友好或通婚关系的其他姓氏的贵族。仅就周原地区而言，见于目前铜器铭文上的，就有珣氏、中氏、散氏、檀季氏、微氏、夷氏等多支非姬姓贵族。^① 他们或是与同处周原的姬姓贵族，如井氏、华氏、虢季氏、函氏等结为婚姻，或是任职于西周朝廷，甚至世为朝廷要臣。此外，如见于文献中的西周早期的辛甲大夫，西周后期的兮伯吉父、樊仲山甫等，亦皆畿内异姓，既是周室姻亲，又任职于朝廷。《国语·晋语四》记周襄王以阳樊之田赐晋文公，阳人不服，仓葛呼曰：“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樊为仲山甫采邑，地处王畿之内，其居民“皆王之父兄甥舅”，正道出了西周王畿所居住的居民族属的性质。不过西周的情形与商代稍有不同者，那就是西周王朝在一些边远的战略要地分封了一批周室子弟或姻亲去做当地居民的统治者，即所谓封建诸侯。他们的封地虽处在王畿之外，却较过去的外服邦方与王朝的关系已有所不同。

①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360—380页。

此乃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之举，这里可暂存而不论。

由上述商周时期内外服统治区域的划分，以及商周朝廷所依据的基本氏族力量的论定，再来考虑夏代的政治结构，并进而推论夏代国家的基本氏族构成，即所谓“夏族”的构成，应当说就比较清楚了。我们认为，所谓“夏族”，第一，应当包含夏代夏后氏的同姓氏族；第二，应当包含夏后氏及其他姒姓氏族的姻亲氏族；第三，应当包含在夏代国家中担任过朝廷官职的贵族所在的氏族。其中第三项可与前两项有所重合，若前两项情况不明，此亦可单独作为判定某一氏族是否属于夏族的标准。

以下，我们就来清理一下文献中提到的这些夏族。

关于夏代夏后氏的同姓氏族，《史记·夏本纪》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里面谈到与夏后氏同姓的氏族颇为不少，不过其中有些是夏灭亡以后夏后氏或其他姒姓氏族的改称，如杞氏、褒氏之类。所谓“分封”，是指姒姓族的分裂繁衍，这些分裂繁衍出去的各个氏族存立于世的时间并不以夏代为限，我们不好将它们都划归夏王朝那个时候的“夏族”。从文献上考察，比较说得准的在夏王朝时期就已存立于世的姒姓氏族大约有夏后氏、有扈氏、有辛（莘）氏、斟寻氏、斟灌（戈）氏、缙氏几支。其中夏后氏为王所自出的氏族，它原本叫有崇氏，故夏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禹亦称为“伯禹”或“崇禹”。有扈氏即《左传·昭公元年》提到的“夏有观扈”之“扈”，《国语·楚语》“观扈”颠倒作“五观”，而称之为夏启的“奸子”。以上《左传》、《国语》二书与有扈氏并称的

“观”实即斟灌（《史记》作“斟戈”），其与斟寻氏当为一对兄弟氏族，《左传》于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记其于夏后氏与寒浞的斗争中曾发挥过作用。有莘氏亦夏的同姓，或说为启支子所封。^① 缙氏据《世本》云，亦为夏少康少子曲烈所封。此外，《史记》没有提到的姒姓氏族还有寒氏，即《左传·襄公四年》提到的“伯明后寒”（当为“寒后伯明”）所统率的氏族。寒为姒姓，西周晚期金文有“寒姒”其人可证。

夏的姻亲氏族，文献记载较为明确的，首推有仍氏。《左传·哀公元年》记有仍为夏后相妻后缙的母家，无须赘言。有仍即有戎，文献或换言之，顾颉刚于此有考证。^② 其次为有虞氏。哀公元年《传》文接着记叙道，少康亦为有过浇追杀，逃奔至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此外，涂山氏亦是夏之妻族，禹娶涂山是尽人皆知的史实。

在夏朝廷任过官职的氏族贵族，文献少有记载，可举者，一为昆吾氏，《国语·楚语》称其为“夏伯”；一为薛国族的首领奚仲，《左传·定公元年》明确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实际上，商人的祖先也曾任职于夏，《国语·鲁语上》记：“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商之先世本与夏后氏错处于河济之间，文献记商亦出自有戎，《诗经·商颂·长发》即称“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后演化为有戎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契之故事。如是，

① 秦嘉谟：《世本辑补·姓氏篇》，《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顾颉刚：《有仍国考》，《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则夏、商均为有戎氏姻亲之国，宜乎商人祖先任职于夏朝廷矣。

总之，要说“夏族”，以上这些氏族是必须考虑进去的。

二

构成“夏族”的基本氏族范围既明，所谓“夏文化”的分布地域，自然就好弄清了。

让我们对以上氏族的居住地逐一进行考察。

先说夏后氏。我过去曾写过《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①及《禹都阳城即濮阳说》^②两篇论文，列举文献证据，证明作为夏后氏发祥地的崇山在汉济阴郡成阳县西北，当今山东鄆城县东南之豫鲁交界处；禹所都的阳城乃古之濮阳，在今河南濮阳以南，这两个地方正相毗邻。这个看法，至今未有改变。当然，我亦注意到，学者中有人对我的文章并不赞成。^③但在拜读彼文之余，我却发现其并未能回答我所提出的涉及我的论点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夏后氏王朝独与东夷交往频繁的问题，夏后氏祖先与颡项、祝融的关系问题，作为先秦文献记载的崇山与汉武帝时始得名的崇山不是一事的问题，禹治水发生的地域问题，古濮阳亦称作阳城等问题，以及夏后氏的好几座都邑都处在东方的问题，这些问题如回避不谈，想是

① 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见方酉生：《夏王朝中心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考析》，《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又《禹居（都）阳城考辨》，《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难以动摇我的论点的。此绝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联系到下文将要讨论的夏代其他重要氏族的居住地来看，有关夏后氏的居处问题将会更加明朗，因为这些氏族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古河济之间，亦即夏后氏兴起的崇山及禹都阳城所在的豫鲁之交一带的。

以下，我们看夏代与夏后氏同姓的几支氏族的居处。

有扈氏。旧说在汉右扶风郡鄠县，即今陕西户县境内。今学者皆以为非，而认其与夏商时期的古顾（或作“雇”）国为一事，其地即《春秋》、《左传》屡次提到的诸侯举行会盟的地点扈，在今河南郑州黄河以北的原武一带。

有莘氏。作为夏代的有莘邑，它的地望应如屈原《天问》所说的“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处在汤未灭夏以前的居邑的东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有“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句，杜于“有莘”无注，但谓城濮在卫地，是其地望略与成汤东巡之有莘相合。《左传·桓公十六年》亦有莘地，杜注称：“莘，卫地，阳平县西北有莘亭。”此在卫地的莘邑当即与僖公二十八年所称之有莘之虚为一地，以今地按之，正在今山东西部接近河南的莘县以北。今学者或引《水经·河水注》，指有莘在今陕西合阳县^①，查《水经·河水注》文明谓此有莘乃“太姒之国”，是此莘邑乃商末辛甲奔周后所受周人之封邑，非夏商时期有莘之故居。以上提到夏商时期的有莘，正处在夏后氏所居的崇山—阳城以东不远处，与之毗邻的今山东阳谷、东阿、茌平一带近年发现不少龙山晚期的古城，我们相信这些古城应当包含有有莘氏在内的夏后氏同

①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姓的居邑。

斟灌氏。亦称作斟戈氏、斟观氏，在卫地，据称亦为夏后相所居住过。^①《水经·河水注》：“浮水故渚又东南径卫国邑城北，故卫公国也……又东径卫国县故城南，古斟观，应劭曰：‘夏有观扈，即此城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我，围观，观降。’”按“卫公国”即春秋卫国都城，亦即濮阳，“卫国县”为东汉所置县名，西汉称“畔观”，即以后的观城县，在今河南范县境内。这里位于卫都濮阳东北，两地相距不过百十来里，因而相居帝丘^②，又复居此，是很容易理解的。

斟寻氏。据载，夏后太康、后羿及夏最后一个王桀都曾以斟寻为都邑^③，是斟寻在夏史上地位亦颇重要。前人对斟寻地望有两种说法：一为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自注及颜师古所引应劭的注释，认为其在汉北海郡平寿县东南，即今山东潍坊境内，理由是平寿县境内有“斟亭”的地名；一是后来臣瓚对《地理志》的另一番注释，他认为班固的自注有问题，因为《尚书序》提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另外《战国策》及《周书·度邑》亦提到夏桀之居在伊洛一带，故斟寻只能在汉河南郡河南城，即今河南洛阳一带寻找。实际上，此二说皆属于推测性质。以北海说为例，此处虽有斟城、斟亭，安知不是由斟姓后人移徙所带来的地名？且斟姓并不一定就是指斟寻。至于臣瓚的说法，其所引《尚书序》之文本就有问题，所谓“太康昆弟五人”云云不过是前引

①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 页。

② 见古本《竹书纪年》，又见《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③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第 10、15 页。